

为展示广大中国作家书写“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征程的成绩，12月11日，中国作协“纪录小康工程”研讨会在京举行。“纪录小康”主题图书作者代表，中国作协相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以及出版社代表等参加会议。现摘发作家王宏甲、李春雷、丁晓平的发言，以飨读者。

——编者

扶贫助弱的世纪回响

□王宏甲

这几年我跑了20多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70多个县市，近300个自然村寨。正是这次采风，让我对我国社会现实，特别是农村，有了更多更深的认识。

当代世界，人类在不同的国度再一次重新认识自由、平等、正义、尊严和幸福的重要性。“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均贫富”，是中国先哲和农民千古相传的追求。中国当代开展的脱贫攻坚战，是人类减贫事业中最为波澜壮阔的行动。

从前谁见过农民有档案？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展的脱贫攻坚战，通过精准扶贫，干部进村入户精准识别出贫困人口9899万人，全部建档立卡。到2018年底，全国有280多万驻村干部在脱贫攻坚前线。那些“乡村的末梢”“峡谷里的山寨”，留下了这个星球上扶贫助弱的世纪回响。有一批干部没有回来，把青春和生命奉献给遥远的村庄。这就是发生在当今的中国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说：“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我是遵循总书记这句话去做的。我创作的《走向乡村振兴》，在关注全国脱贫攻坚大战场的同时，特别记述贵州毕节脱贫攻坚实践，这是全国贫困程度最严重的地级市之一。它有三个深度贫困县，也在全国最后脱贫之列。为什么关注曾经最贫困的地区？你可知它以怎样的验收实绩脱贫？

脱贫的系列指标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脱贫线，2020年全国指导标准为4000元。全国最富庶省份之一的江苏，自定标准为6000元。毕节最后脱贫的三个县，能达到怎样的脱贫线？经“第三方”验收，评估结果显示，毕节最贫困的威宁、纳雍和赫章三县，贫困户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一万元。

很多人可能感觉这有点意外。多少年，“贫困的标签就贴在毕节的脸上”。毕节是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贫困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且是我国唯一的“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早在2014年5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对毕节试验区工作作出的重要批示中就指出，“毕节曾是西部贫困地区的典型”。总书记对毕节倾注了最深切的关心，曾指示：“建设好毕节试验区，不仅是毕节发展、贵州发展的需要，对全国其他贫困地区发展也有重要示范作用。”

贵州省及毕节市没有辜负总书记的期望。他们收获的最宝贵的经验就是：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历史告诉我们，“组织起来”是不能忽略的常识。1840年中国的大门被英军炮火轰开之时，中国就像个大乡村。从那时起，“振兴乡村”就放在中国人面前了。西方列强的公司、工厂都是组织起来的状态。中国人多，各自耕种形同一盘散沙。1840年那场战争，是组织起来的英国侵入一盘散沙的中国。结果是，“组织起来”打败了“一盘散沙”。

即便是“一盘散沙”的中国农村，仍蕴藏着救中国最伟大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农村中把广大人民组织起来，以“农村包围城市”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经历了土改、合作化运动，建立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是春秋战国以来土地私有制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劳作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几亿农民也组织起来了，与西方社会的根本区别是：中国农民走上了共同致富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问题，实为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一部分。这无疑是学术史上颇为关键的问题。不过，在不少人看来，这已经不是“问题”或是已经解决的问题。然而，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曾经说过：“吾侪若思养成鉴别能力”，须“能向常人无疑之点能试怀疑；能对于素来不成问题之事项而引起问题”。其实，目前学界关于文学现代转型问题的结论是颇可“怀疑”的。

多年以来，学界一般是将五四文学列为现代文学真正形成的标志。其主要观点可分为三种。一是将转型归因为语言层面的“文白之变”。这种观点最为可疑，因为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前，白话文学早已存在千年以上的历史，胡适甚至还以之撰成专著《白话文学史》，可见语言并不构成转型的必要条件。另一种观点是将转型归因为个性主义的兴起。郁达夫说过，“五四运动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这的确是不易之论。席卷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即以“个人的发现”重新勾勒文学变迁的轨迹，直到今天仍对学术研究发生强有力的形塑作用。不过，如果我们静心细读晚清小说，对于类似观点的信任就可能出现问题。比如，有一本不太知名的小说《柗机萃评》（诞生，1905），内中讲到一个小叫碧珍的女子，率性独立，弃家私奔，她有一段话，比鲁迅《伤逝》中子君的话“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的权利”更像是“人的觉醒”的宣言：“我要不愿，就是叫我做娼妓、福晋、一品夫人，我也不要做；我要愿，就是叫我做个外妇、私窠、通房丫头，也没有什么不可。”而且，这个何碧珍还说：“我觉得只要男女合意，不拘一夫多妻、一妻多夫，都无不可。”这般的超世俗，就绝非子君所能想象的的。可见，若论“个人的发现”，晚清小说恐怕不逊于五四小说。依此而论，将个性主义作为文学现代转型的根据，其实是大可疑的。第三种观点，将现代转型归因于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同样不能说是“不成问题之事”。鲁迅的“铁屋子”、“未庄”无疑是“老中国”的隐

百年实践也让我们反复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多么重要。加强党的领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全球化时代”，我国更要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在我国农村真正加强党的领导，就意味着要坚守党的宗旨，要有紧迫感引领农民发展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走共同致富的道路。

毕节的具体措施，首先是遵照省委部署，学塘约村在党支部领导下创办“村社一体”的合作社，取得试点经验和成效后，在全市推行“党支部领办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村干部和党员率先入社，将贫困户全部吸收进合作社，以强弱联合凝聚乡村社会，并不断吸收非贫困户自愿入社。毕节有3700多个行政村，均分别成立了党支部领办的全体村民所有的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和党支部领办的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实现了党组织对全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合作经济组织的全面领导。实践证明，这是脱贫攻坚的最佳途径，也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保障脱贫不返贫的必要举措。

本书还记述了山东烟台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实践。毕节和烟台，一个在西部，一个在东部。两地实践证明，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在贫困地区可行，在经济发达地区也可推行。

2018年7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对毕节试验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毕节在确保按时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同时，做好同2020年后乡村振兴战略的衔接，并要求努力把毕节试验区建设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示范区。自此，遵循新发展理念，倾力去做衔接乡村振兴的工作，成为毕节的奋斗目标。

再说毕节的第二个重要举措。几年前塘约村脱颖而出，在于解决“一户农民的单打独斗”问题。毕节全市推行党支部领办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后发现：如何解决“一个村的单打独斗”，上升为具普遍意义的新问题。这促使“乡镇党委统领合作社”在毕节应运而生。此举非常重要，因为即使把一个村的全体农民都组织起来了，仅靠“村自为战”是难以实现乡村振兴的。迈出这一步，乡镇党委书记、县委书记也由此凸显出更关键的领导作用。

毕节通过“大党建统领大扶贫”，把多种经济形式的经营者组织在新时代的统一战线里，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与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私营企业并存，共同致力于乡村振兴。由于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吸纳了全部贫困户和很多非贫困户农民，倡导按劳分配为主，劳动报酬一般高于大户支付的劳动力工钱，越来越多农民更愿意加入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劳动力流向发生改变，跟随大户打工的农民逐渐减少，以至有一批种养大户相继加入到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中来。这个新情况说明，最有力量其实就是劳动人民，人民选择哪里，哪里就会发达。

无论乡村与城市，党和人民的密切关系才是我们国家坚强有力的保障。乡村振兴不只是乡村的事，它需要全民族的关注和努力。没有乡村振兴，就没有全民族的复兴。

乡村振兴，匹夫有责。
民族复兴，匹夫有责。

中国作协“纪录小康工程”研讨会发言摘登

以时间为方法

——中国小说现代转型论 □张均

喻，但《孽海花》开篇就有对“奴隶岛”的描述，说这岛上的岛民“没有一个不是奄奄一息、偷生苟活”，“崇拜强权，献媚异族”，“从古没有呼吸自由”，“却自以为是有，有吃，有喝，有功名，有妻子”，这又何曾不是对现实中国的讽喻？《老残游记》关于“沉船”的描绘，与“奴隶岛”也相去不远。甚至，晚清小说的这些民族国家想象比五四还更直接、更强烈。

可见，目前学界所论，如“个人的发现”与“民族国家认同建构”，虽然很有道理，但究其实，并不能对晚清小说、五四小说做出有效的区分。如果说鲁迅小说是“现代文学”形成的标志，那么晚清谴责小说何以就不能担承这种文学史荣誉呢？也正因此，海外学者王德威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问题，甚至被认为有贬损五四文学的学术意识形态在内，因为按照王德威的看法，晚清文学的现代性已呈众声喧哗之势，到了五四反而被压抑、被窄化甚至被单质化了。王氏论点，争论极大，因为无论《孽海花》《老残游记》，还是《文明小史》《柗机萃评》，显然都不具备《呐喊》《彷徨》那种前无古人的现代感。不过，若仅从个人意识、民族认同建构去理解“现代感”，《呐喊》《彷徨》对《孽海花》等确实没有实质性的超越。那么，中国文学的“现代感”是否还别有所属呢？

赵斌的《中国近现代小说中的时间问题研究（1898—1927）》一书，正是对此问题的回答。他说，“中国小说现代转型”不同于以往小说上任何朝代、任何阶段小说的变化，而这一变化的关键是小说的时间问题。”这是相当敏锐的看法，但这种看法并非否认学界关于个人的发现、民族国家认同等研究成果，而是进一步的发现与拓展。对赵斌的观点，我是这样理解

小康社会，几千年来就是中国仁人志士和政治家们的社会理想。但由于历史局限和种种原因，这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无奈的梦想。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全心全意的百年追求。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之后，更是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奋斗目标。而今，脱贫攻坚胜券在握，建成小康社会就在眼前。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华民族将真正告别贫困，走向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壮举。实在可喜可贺，应该大书特书。

回想自己这些年的创作，我感觉十分幸运，也有所收获。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刚刚提出“精准扶贫”构想的时候，我恰好正在中国最贫困的甘肃省定西地区采访。在这里，我认识了后来壮烈牺牲在扶贫第一线并被评为“时代楷模”的临洮县县长柴生芳。在与他的交谈中，我第一次听说了“精准扶贫”这个名词，感觉眼前一亮。精准，干什么都要精准，不然就是事倍功半。当时，我就深入采访几个贫困村，创作了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脱贫攻坚报告文学创作工程”的一分子，用自己的笔为人类的伟大奇迹做一点记录员的工作，我深感自豪和光荣。这次采访的地方是井冈山茅坪羊神山村。在采访前，我专门阅读了4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我要学习并懂得革命斗争的历史；一本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摆脱贫困》，我要领会“滴水穿石”“笨鸟先飞”的脱贫经验；一本是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我要明白社会调查的方法和乡村历史文化经验。同时，我还认真阅读了王宏甲先生的《塘约道路》，看一看神山村与塘约村有什么不同，避免我的写作成为脱贫攻坚题材的复制品。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神山，是我心

小康志 新史记

□李春雷

第一篇扶贫题材报告文学《党参沟心事》。而后的几年内，我又多次走进太行山深处的贫困乡村，写出了反映时代楷模李保国扶贫故事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山教授》和反映一个山村家庭走出贫困的短篇报告文学《太行梦》；深入到内蒙古高原深处的贫困村，写出了反映农民养毛驴致富的短篇报告文学《黑毛驴，白毛驴》；深入到广西百色革命老区，写出了时代楷模黄文秀扶贫故事的长篇报告文学《秀儿》和反映当地农民依靠种芒果致富的短篇报告文学《芒果城》；深入到河北省广平县农村，写出了反映壮烈牺牲在扶贫岗位上的县扶贫办主任郑贵章事迹的短篇报告文学《县扶贫办主任》。2016年，我再一次深入临洮县，写出了反映驻村第一书记王海妮扶贫故事的长篇报告文学《妮妮下乡》。2018年，考虑到方志敏烈士名篇《可爱的中国》中描述的理想中国就是小康社会，我特别深入到方志敏烈士的家乡一带采访，写出了短篇报告文学《告慰方志敏》。特别是2019年，我接受中国作家协会委派，承担了反映习近平

我写的是奔小康的历史

□丁晓平

中向往的地方，此前我还没有去过。作为一名军人，我向往着能够早日完成这次“朝圣”之旅，但没想到的是第一次来井冈山，竟然让自己的人生旅程与伟大的脱贫攻坚工作有了如此紧密的联系。井冈山的红米饭、南瓜汤，曾经滋养了一支人民的军队、壮大了一个人民的政党，成为中国革命的摇篮，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而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井冈山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又率先实现致富奔小康的梦想。

说句实在话，如果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说，神山村的脱贫故事不够写一本书，就是写一个短篇也不会有多精彩。神山村很小，只有54户人家，分两个小组，曾经有21户贫困户，既没有致富带头人，也没有特别突出的村干部；既没有可以作为文学形象来挖掘、塑造的典型，也没有作为新闻宣传的典型。因此，如何把一个村庄的脱贫攻坚写成一本书，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2019年10月在神山村生活了7个日夜之后，我整整

总书记视察过的张北县德胜村脱贫故事的长篇报告文学《金银滩》的创作任务，而后走进塞北高原小村，冒着零下32度的严寒，完成了对主人公的采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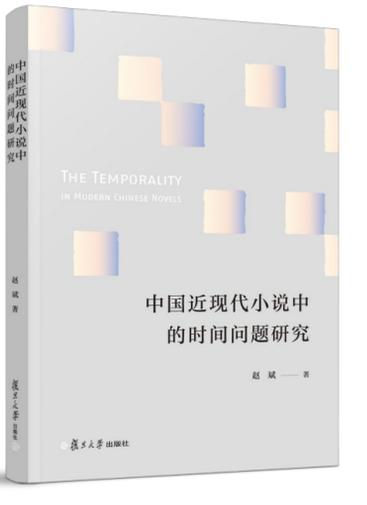
通过这些创作，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时代脉搏的跳动，听到了整个国家在迈向小康社会进程中的铿锵的脚步声。但是今天，当这个伟大时代马上就要到来的时候，回想以往，展望未来，深深思考这一宏大历史事件的特殊意义，又不得不自觉汗颜，自愧不如。

一个时代拥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史志。鲁迅的《故乡》《祝福》，沈从文的《边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孙犁的《风云初记》、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等等，都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具有史诗般的呈现。

全新的小康社会生活，是当今中国最精彩的现实。为民族复兴写史铭志，为全面小康树碑立传，这是我们文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只有这样，才能无愧于自己的人生，无愧于伟大的时代。

思考了三个月，然后又阅读了2015年至2019年有关神山村近100万字的所有新闻报道才敢动笔。这次采访，也为自己作了一次“扶贫工作”的“扫盲”。

如何把一个村庄的脱贫攻坚写成一本书历史之书？那就要求我必须做到两点：一是面对乡亲们，我不仅仅只是一个记录者；面对读者，我不仅仅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不只是写好人事物的作家、写典型人物的作家，我要写出神山村乡亲们的精气神，写出新时代的中国乡土和乡土中国，写出一个让神山村乡亲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村庄。《神山印象：一个村庄的脱贫攻坚史》完成了我的创作愿望，从一家一村、一乡一县折射了一个国家脱贫攻坚的历史，记录中国人民奔小康的历史。11月21日，我参加了“中国一日·美好小康”直播活动，我给每一位接受采访的乡亲们送了一本书，他们都非常喜欢，给我竖大拇指，说我写的都是真的，没有写一句假话。我知足了，我觉得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增多所致。比较起来，这种“再空间化”与时间化（历史化）并不形成冲突，而是推动、深化了业已发生的文学现代转型。

在学术上，赵斌是一个不愿墨守成规、锐气逼人的青年学者，这与他沉稳、宽厚的性格恰成映照。因此，他的研究，总与挑战、尝试、解构、创造等相关联。这造就了他鲜明的学术个性，令人印象深刻。这本专著是他的博士论文，也是他第一部学术专著，是他未来学术道路上可喜的一步。就我而言，看到这部著作的出版，却不由得想起近20年前，谢冕先生参加我的博士论文答辩的情景。当时，我也在论文中将时间列为主要思考对象，谢先生问我：“你为什么对时间问题如此重视呢？”我对他做了简短的解释，并希望自己日后对此问题有一个系统而令人信服的研究。遗憾的是，时光流逝，我最终未能完成这一工作。所以，现在看到赵斌专著的出版，我感到当年谢先生的问题，可以说是有着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答案了。